

中韩

佛教关系二千年



陈景富 /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宗教文化出版社
PDF

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

陈景富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陈景富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4

ISBN 7-80123-206-2

I. 中… II. 陈… III. 佛教-对比研究-中国、韩国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27235 号

H1166/10

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

陈景富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电话:64023355-2504 邮编:100007)

北京北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75 印张 650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23-206-2/B·17

定价:38.00 元

新
学
社
PDG

自序

(一)

我之与中韩佛教关系史研究结缘，其实是以参与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撰写“长安佛教研究丛书”为开始的。

长安是历史上13个王朝建都的地方，在长达千年以上的时间里，它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往的中心；自西汉末年以降至于隋唐，它还是中国佛教的弘传中心。无论是从释史文献还是正史记载而言，有关长安佛教的资料都是十分丰富的，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概括出长安作为当时的弘法中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汉地的首传之区，其标志是西汉博士景卢（又称秦景宪）从月氏使口受浮屠经；同时也是西行求法的先驱者朱士行迈出第一步的地方。其次，自西晋竺法护于长安青门外大寺开长安佛教译经之先河，以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玄奘、义净和不空为首的一大批中西（域）高僧继之于后，从而开创了长安佛教译经事业“郁为称首”的新局面，使长安成为中国佛经翻译最大、最主要的重镇，自东汉永平十年至唐贞元十六年，先后翻译、编撰出佛教三藏经典、章疏以及贤圣集传总共2447部7399卷，约略估计，其中的半数出自于长安。再次，由于历代帝王的护持，这里会集了全国各地的著名高僧，他们在此讲经弘法，著书立说，创立了诸多的学派和宗派，仅以佛教的8大宗而言，其中的6宗就创立于长安。又再次，据梁《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的不绝对准确的统计，自佛教始传至宋端珙年间（988—989），居住于长安的

名僧大德为 461 人，占三种《高僧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如果将曾经到长安游学暂住过的高僧亦计算在内，其数目则无疑地还要比这大得多了。这样一大群“僧宝”往往又都是些兼通儒道等诸子百家学说乃至坟典的饱学之士，不少人甚至是一代英杰时彦，他们在加速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曾经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与本书关系十分密切，而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长安还是一个佛教文化国际交流的大都会，周边国家诸如五天竺、中亚各国、东南亚各国、海东及日本等国的僧人前往长安的传法、求法者，络绎于途，代不乏人，在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之一的历史上，长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辐射源，它无疑地是世人记忆中永远闪光的名字。由于诸如上述的种种因素，以至于有“长安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和“长安佛教乃半部中国佛教史”之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离开了长安佛教，我们便无法编写中国的佛教史。正是在为编写“长安佛教研究丛书”而翻阅释典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包含着大量有关中韩两国佛教关系方面的资料，而且过去还很少有人对这些资料进行过全面而系统的清理和总结，心中于是开始萌发了一种新的创作冲动。同时，也由于韩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从一开始便是用汉文来记载的，乃至到了十八世纪时仍然存在着全部用汉文撰写的碑铭之类的文献，这就使得我能拥有、参阅更多的资料，从而使我在中韩（朝）文化交流史和中韩（朝）佛教关系史的研究和写作上大大地增加了方便。存在于韩国方面的这些汉文资料，不仅对中国学者是重要的，而且即使是对于今天的韩国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来说也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离不开的。

1986 年 11 月，全国性的“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在众多著名学者提供给研讨会的论文中，黄心川教授所撰写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一文

给与了我很大的启示。此后不经年，我相继完成“丛书”中数十万字的写作任务并付诸出版之后，便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到了中韩（朝）佛教文化交流史研究这方面来，而且在此后的十年中相继出版了几种这方面的著作，诸如《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撰写序、全部正文13章和附录一）、《海东入华求法高僧传》（撰写全稿）、《中朝历史交往诗辑注》、《高丽大觉国师义天年谱》和《〈大觉国师文集〉作品系年》（后两种于1997年由韩国天台宗《金刚》月刊译成韩文连载，现附录于本书之后）。这本书则是我根据多年来研究所得的新旧成果总结整理、增扩改写而撰写的新作。

（二）

《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顾名思义，其内容主要是叙述中国与韩国两国佛教界在一千年长的时间里交往的历史。这个一千年，上起公元4世纪前半叶，下迄14世纪中后期。在中国，相当于两晋时期至元末明初；在韩国，相当于前三国中期至高丽王朝末年。李氏朝鲜建立之后，其最高统治者实行崇儒抑佛政策，海东佛教走向衰落，两国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趋于停滞状态，故本书不再将其列入叙述的范围。

中韩佛教关系，实质上是两国间在佛教领域里所进行的全方位性的交流活动，其内容包括两国僧人的往来传法、求法活动，经籍的流通，学说的研传，建寺、立塔、造像、绘画、梵呗以及铸钟、书法与雕版印刷艺术的传播交流等等。参与此项活动者，既有僧人，亦有俗众；俗众之中，又上有国君僚属，下有士庶百姓，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交流内容的丰富多彩，活动牵涉面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久，都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所罕见的现象。

中韩佛教关系史上的这种罕见现象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

史背景和原因的，换言之，两国佛教界的密切关系是由两国间政治上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是以两国间悠久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作为大背景的。没有上述这些因素、这些基础、这些条件，佛教上的交流也就不会成为可能的事情，或者说，至少是不可能象这样的源远流长。综观中韩两国的历史，完全可以这样概括的说：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是主流，是长期的；关系疏远，乃至兵戎相见，这是支流，是短暂的。这一总的形势，无疑为两国政府间和人民间的往来，为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打下基础，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文化的交流增加了机会。两晋至南北朝时期，海东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求法活动也主要表现在注重经典研传方面，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形势相吻合，而且明显地趋向于汉文化，所以求法足迹多在江南，其中心则是六朝古都金陵（扬都）。唐朝与统一新罗的关系可以说是历史上两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里，三国末年和统一新罗的入华学僧人数比其他各个历史时期的入华学僧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在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上也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之最，中国佛教诸宗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在这时传入海东的，佛教艺术的各门类的交流也达到了既全又精的程度。唐亡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又一个分裂时期，一方面先是由于中国境内战事频仍，政权迭变，继而是北宋王朝实行的“先南后北”的政策又姑息、纵容乃至养成了契丹辽的势力，面对其威胁，宋政权自顾不暇，根本无力策应高丽，为其分忧；高丽王朝在辽的侵扰下，由于得不到宋的实际援助，只好对辽俯首，于是乎宋、丽两国关系断绝达数十年之久。因此，这时中国与高丽王朝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无疑难比于唐朝时期，但应当说还在继续着。与此相应，佛教交流方面也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海东求法者自华还国者多，西

来者则寥寥无几，可数者不过谛观、义通、智宗而已。此外，佛教典籍的求、赐一项也还屡见于史籍。总而言之，兴盛谈不上，但却有着一定的重要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中国华严宗、天台宗的中兴；二是使中国禅宗法眼宗盛行于高丽，同时促使天台宗在高丽的正式成立；三是促进了高丽《大藏经》的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不数十年之后，女真金在中国东北养成势力，相继攻灭辽和北宋；高丽先是受制于金，随后又被蒙古铁蹄蹂躏，对南宋政权欲通而不敢；而南宋对高丽亦有所提防，故在与高丽的交往问题上颇显小心谨慎。这时，南宋与高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虽未完全中断，但也不过是在私商和民间进行罢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终南宋一代，海东与中国的佛教交流也出现了罕见的沉寂局面，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都无求法者的行踪。直至元朝建立，并与高丽王朝确立了“甥舅”关系之后，两国间的佛教关系才又开始密切起来。这个时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中国禅宗临济宗盛弘于高丽，颇与中国禅宗“临天下”的特点合拍；二是高丽唯识学僧多有在元都讲学者，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中国唯识学衰微的事实。以上事实无不说明，中韩两国的佛教关系是以两国的政治关系为先决条件的，同时也是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依托的。反过来，佛教文化上的交流也有助于加深两国间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在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也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例如，中国唐代的服章制度就是新罗国王根据入华求法僧的建议而采用的；道证在唐求法的同时还努力学习天文历法，还国时曾给新罗王献上唐朝的天文图；大觉国师义天的入宋求法活动既是高丽王朝与北宋关系缓和的结果，同时又对这一缓和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僧人在两国政治交往中直接充当使节更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僧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很明显，义天上《铸钱论》，沿引中国使用货

币以利国便民的历史说服肃宗实行铸钱法；宋代商人利用与高丽僧人的密切关系推进两国间的经济贸易等等，都是十分生动的例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至于与文化的关系，佛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而且是整个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佛教交流其实就是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它对于其它文化的交流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并且是随处可见的。

因此种种，对中韩两国间这一非同寻常的佛教关系历史作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总结就显得特别重要。就其历史意义而言，通过此一研究，一可以理清两国佛教之间源与流的关系，二可以在比较中发现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的特点，三可以明了此一交流并非单向性的，是中韩两国僧人的友好合作、共同努力，提高了佛教文化的水平，充实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宝库。总的来说，无论对中国佛教史研究还是对韩国佛教史的研究都是十分有益的。不仅如此，它对于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一般的文化关系的研究也能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就现实意义而言，通过借鉴历史，发扬传统，则必定能在新的时代里促进和加强两国间的合作与交流，当然也包括佛教领域里的继续合作与交流。

(三)

如前所述，释史文献中有关中韩佛教关系的资料确实不少，但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所首先碰到的问题也在这里。在我所接触到的资料中，无论是中国方面的还是韩国方面的，其芜杂情况且不去说，有关神话传说也另当别论，单是错讹一项就够费心劳神的了。就错讹的性质类别而言，大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时间久远，时过境迁，或时、或地、或人、或事，都已混淆不清，原始记载已不准确，复经转抄引用，于是更是以讹传讹、错上加

错。诸如圆光、缘光的入华时间问题、圆测的出身问题，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且更多的是宗教上的需要，或无端地编造，或模仿性地编造，或有意夸大事实，诸如义信西域求法白骡驮经而回的问题、义湘与洛山观音信仰问题、义天入宋传五宗问题、道说从师于中国一行和尚的问题，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凡此种种，几乎随时都会碰到，因此都需要对之进行细心的甄别、考辨，去伪存真，以便理清复杂而纷乱的历史线索，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作者不敢说本书所引用的资料都已全部考辨清楚，作到绝对的准确无误，但的确对已发现的疑误问题都做过一番努力，以求找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对具体历史事件或人物做出尽可能恰当的评价，这也是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另一个方面。但有关约定俗成的传统旧说，或者文献资料的残缺不全，都给此一工作造成颇大的困难。例如关于海东法将圆测是否是玄奘三藏的弟子的问题，传统说法皆众口一词肯定“是”，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明系学说在大多数场合被说成是与玄奘三藏的思想相对立的，但在实际上他们之间也并非完全没有相通之处。又例如，新罗僧地藏与九华山地藏菩萨信仰道场之关系问题，固然，此一道场的形成与新罗金地藏住山有关，但金地藏本人不过是一个亦禅亦净、禅净双修的行者，只是由于他寂后骨节撼动发出声响与地藏菩萨寂后的迹象相同，而且传说葬地发出圆光，所以人们才把他当作地藏菩萨的化身礼拜供养，并最终形成专门道场。一句话，是人们依据地藏菩萨的有关经典、从现实需要出发创造了这一化身、这一道场；如果把新罗僧地藏说成是修习地藏法门者，甚至于把他当作将地藏菩萨法门从新罗回传于中国的形象来加以称道，这便与事实相去甚远了。在入学僧研习三论学方面，以往更多注意的是僧朗其人，而对陈隋之际的印法师和实法师却并不怎么在意。但当读到此二人

中一死一走，金陵法席于是凋散这些资料时，就不禁觉得这二人亦非等闲之辈，很有些主帅或股肱的气象。类似这样被历史灰尘弄得模糊不清的事例还有不少。对此，本书都尽量根据所占有的资料从新的视角去进行审视和评判，但愿不违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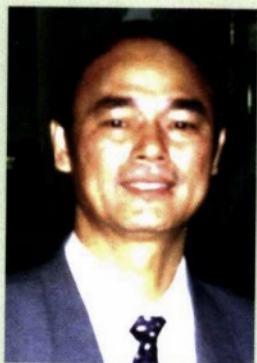
在中韩（朝）佛教关系史中，“源流”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海东佛教而言，其源在中国，这应该说是一个没有人怀疑的事情，因为可据可证的事实实在太多了。关于“流”的问题，须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是中国佛教的各种信仰、各种学说、各个宗派发展到哪一个阶段才开始传入海东，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我们对佛教交流阶段性特点的把握；二是佛教的流向是单向性还是双向性的，换言之，不仅是中国佛教传播于海东，影响于海东，而且海东佛教也回传于中国，影响于中国。对于前一个流向，大概也没有谁去怀疑；对于后一个流向，认识可能就不会那么一致，即便持肯定态度，也不见得就那么到位。正是出于上述这样一些认识和估计，我在撰写本书时，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对佛教各宗在中国发展的梗概做一叙述介绍，以利于明了佛教传入海东的形势和内容；另一方面又对有关“回传”的资料曾给予过密切的关注。事实证明，韩僧中不仅有学在中国，弘化在中国，为中国佛教作出贡献者，诸如三论宗、唯识宗、法华宗、密宗、禅宗以及译经场中都有这样的杰出人物；而且还有虽未入华，在本国自学成才后，其著作却流传于中国，对中国佛教影响至深者，诸如元晓、太贤、顺憬等等，都是这样的一类人物。对于前一类人物，本书皆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对于后一类人物，因其不属于入华求法僧，故在书中虽已提及，但并未展开讨论。无论是哪一类人物，他们在佛教上的贡献都是巨大的。中国佛教著名学者杜继文教授曾这样说过：“韩国僧人在佛教上的贡献并不比中国僧人差。”仅就我之寡见言之，杜教授对圆测、元晓的著作，如《解深

密经疏》、《起信论疏》、《起信论别记》等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其中，他在《评元晓关于〈大成起信论〉的疏解》一文中这样说：“元晓的佛学范围及乎中国当时所有的大乘思潮，‘要解’了当时盛行的大乘基本典籍，所以在佛学领域里，博学多识，就成了他的一大特点”，从而“也才能具备在中国佛教各个学派中评判是非，纵行取舍……组织自身学说的条件。”“我以为，《起信论》是对南北朝诸种佛教流派的高度概括，对隋唐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称其为中国佛教的哲学大纲，也不为过。”元晓的《大乘起信论疏》二卷“就是在中国佛教界享誉极高的《海东疏》”。“仅就确定《起信论》在全部佛教中至高无上（即‘既智且仁，亦玄亦传’、‘诸论之祖宗，群诤之评主’）的地位及其独立性质言，元晓之影响于中国佛教可谓大夷远夷深夷，而其所以能够率先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于他对中国当时佛教思潮的熟悉和敏锐的观察。”由此我们更加确信，关注中韩佛教关系中交流的“双向性”问题和“互补性”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必要的，需要继续展开研究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韩两国学术界和僧界的共同努力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以及整个中韩佛教关系史的研究，必将日益深入，取得更大的进展，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我期盼着这一天。

当我写完以上这些话的时候，书斋窗外已经是柳绿桃红的春天。前几天虽然纷纷扬扬地下过一场雪，好象是要阻挡春天的脚步似的。但时令既已到来，雪很快便消溶了。经雪水洗去冬天积下的尘垢，春天变得更加姹紫嫣红。唯劳动者，不负春天！唯劳动者，可沐浴春天！唯劳动者，无愧于春天！用劳动去编织春天，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职责。

作者于西安寓所无说斋

1998/3/13



作者简介

陈景富，汉族，广西玉林市人，1941年生。1966年大学毕业。现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长安佛教史和中韩（朝）佛教关系史。已出版的著作，除本书“自序”中提及者外，还有“长安佛教研究丛书”中之3种、《法门寺史略》、《三秦历史文化辞典》（主编之一）、《中国佛教十大名山》（主编）等，发表的论文有《武则天崇佛心态三段论》等30余篇，总字数约2百万左右。《韩僧在华求法遗迹巡礼》（以图为主，以文为辅）、《西安与朝鲜》（“古都西安丛书之一”）两书即将结稿。

505-6/10



目 录

自 序.....	(1)
----------	-----

传法求法篇

第一章 中韩佛教之渊源关系.....	(1)
--------------------	-----

第一节 中国佛教东渐前之发展形势.....	(1)
-----------------------	-----

第二节 顺道开高句丽佛教之先河.....	(6)
----------------------	-----

第三节 摩罗难陀绍百济佛教之端绪	(10)
------------------------	------

第四节 阿道于新罗“逢时指法”	(11)
-----------------------	------

第二章 四至十四世纪间韩僧的人华求法请益活动	(17)
------------------------------	------

第一节 求法请益活动兴起的原因	(17)
-----------------------	------

第二节 求法请益活动综述	(21)
--------------------	------

第三节 求法请益活动的特点	(25)
---------------------	------

第三章 天竺巡礼——入学韩僧的“二次求法”	(34)
-----------------------------	------

第一节 西域求法的先驱者——谦益与义信	(34)
---------------------------	------

第二节 唐初的韩国西域求法僧	(36)
----------------------	------

第三节 慧超和他的《往五天竺国传》	(39)
-------------------------	------

第四节 最后的韩国西域求法僧	(52)
----------------------	------

第五节 韩国入学僧西域求法活动总结	(54)
-------------------------	------

佛典流通篇

第四章 中国佛典的翻译、结藏与东传.....	(56)
------------------------	------

第一节 中韩佛教典籍的流通	(56)
---------------------	------

第二节 《高丽藏》雕印源流及经过	(73)
------------------------	------

第三节 唐代译经场中的入学韩僧	(78)
-----------------------	------

宗派研传篇

第五章 入学僧对“三论”学说的研习	(88)
第一节 僧朗与中国佛教三论学的重兴	(88)
第二节 陈隋唐之交研弘三论学之入学韩僧	(91)
第六章 入学僧对中国佛教天台教观的研传	(95)
第一节 中国天台教发展概况	(95)
第二节 玄光与慧思的“法华安乐行门”	(97)
第三节 入学僧与智者大师的天台教学	(99)
第四节 中唐晚期赤山新罗法华院的弘法特点	(105)
第五节 谛观、义通与中国天台教的中兴	(109)
第六节 智宗、义璇对天台教观的研传	(121)
第七章 入学僧对中国佛教律学的研传	(125)
第一节 中国律学发展概述	(125)
第二节 海东三国传律之先后	(131)
第三节 圆光的世俗五戒与占察宝	(134)
第四节 慈藏的弘律护律活动	(140)
第五节 新罗、高丽其他传律学僧	(145)
第八章 入学僧对中国佛教华严学的研传	(148)
第一节 中国华严学发展略说	(148)
第二节 僧朗、慈藏与华严学	(150)
第三节 义湘师徒的求法与传教	(156)
第四节 梵修与澄观《贞元新译华严经疏》	(168)
第五节 高丽入学僧对华严学之研传	(170)
第九章 入学僧对中国佛教密教的研传	(174)
第一节 明朗、惠通对杂密的研传	(174)
第二节 金胎两部大法传播海东	(179)
第三节 元代密教对高丽佛教的影响	(191)

第十章 入唐僧对中国佛教唯识学的研传	(201)
第一节 义渊、圆光与早期唯识学	(202)
第二节 唯识宗西明学系领袖——圆测	(206)
第三节 圆测以外的新罗入华唯识学僧	(219)
第四节 高丽时期入华的唯识学僧	(226)
第十一章 入唐僧对中国佛教禅学的研传	(231)
第一节 双峰禅与东山法门的研传者	(233)
第二节 北宗禅与韩国禅宗之曦阳山派	(237)
第三节 蜀中禅法的代表人物——无相	(241)
第四节 慧昭与宗密禅的关系	(250)
第五节 南宗怀让系禅法在韩国的传播	(253)
第六节 南宗青原系禅法在韩国的传播	(278)
第七节 元明之际中国禅法之东传	(303)
第八节 中国佛教禅宗东传的特点	(331)
弥陀与菩萨信仰篇	
第十二章 中韩两国的弥陀净土与诸菩萨信仰	(336)
第一节 弥陀净土信仰及其东传	(336)
第二节 观音菩萨信仰及其东传	(344)
第三节 弥勒菩萨信仰及其东传	(354)
第四节 新罗僧地藏与九华山佛教信仰	(362)
佛舍利崇奉篇	
第十三章 佛舍利崇奉及其对海东佛教的影响	(378)
第一节 佛舍利崇奉缘起	(378)
第二节 海东佛教中的佛舍利崇奉	(387)
第三节 海东佛舍利崇奉与祈祷佛教的深化	(395)
名僧专题篇	
第十四章 义天人宋求法活动及其弘法业绩	(400)

第一节	义天生平略述·····	(400)
第二节	义天入宋求法原因、经过及意义·····	(403)
第三节	义天的编藏和撰述活动·····	(413)
第四节	义天的佛学思想·····	(420)

僧俗杂论篇

第十五章 韩国其它僧俗在中韩佛教关系史

	上的作用与地位·····	(442)
第一节	韩国汉文佛教碑铭及其作者·····	(442)
第二节	张宝皋与中韩佛教交流·····	(457)

佛教艺术篇

第十六章	中韩佛教艺术的交流·····	(464)
第一节	中国佛教艺术的发育成长·····	(465)
第二节	佛教建筑艺术的交流·····	(479)
第三节	佛教造像艺术的交流·····	(488)
第四节	佛教绘画美术的交流·····	(499)
第五节	梵钟、梵呗与写经艺术的交流·····	(503)

求法遗迹篇

第十七章	韩僧在华求法遗迹概览·····	(509)
------	-----------------	-------

附录

一、高丽大觉国师义天年谱·····	(586)
二、《大觉国师文集》作品系年·····	(614)